

美国犹太大屠杀叙事再现和重构历史的方法*

刘文松**

内容提要: 当代美国主要的犹太小说家,包括索尔·贝娄和艾萨克·巴·辛格等,都从正面或侧面、或繁或简地描写了犹太大屠杀及其幸存者的情况。美国犹太小说对大屠杀记忆的再现呈现出六种方法:对大屠杀及其后遗症的直接描写,厚描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对帮助犹太人逃亡的机构和个人的表彰,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记录,表现幸存者后代的愤怒和救赎,对大屠杀经典文本的后现代改写与重构。把这些小说集中在一起,呈现出一幅犹太大屠杀历史的全景图。

关键词: 犹太小说; 大屠杀; 再现; 历史

Abstract: Most major Jewish American novelists including Saul Bellow and I. B. Singer represent the Holocaust memory in their fiction in one of six ways. They either directly describe the Holocaust and its aftermath, or focus on the memories of survivors or their children, represent the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helping Jews escape, the trial of Nazi criminals, the rage and redemption of survivors' children, or rewrite Holocaust classics. These different ways of remembering history demonstrate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s.

Key words: Jewish novels; Holocaust; represent; history

*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合作项目“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铭记历史的方式”(2008B2086)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刘文松,厦门大学英语系教授,香港大学博士。主要研究美国当代犹太人和黑人小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纳粹反犹太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灾难。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纳粹主义……是由人们能够想象得出的最阴险的、使人厌烦、令人憎恶的小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希姆莱可能是个农学家,娶了个护士为妻。要知道,集中营就是由这个医院的护士和这个养鸡场的饲养员共同想象出来的。医院加养鸡场,这就是集中营后面的幻影。他们在集中营杀害了几百万人。”(福柯 287)福柯用医院的意象来描述集中营是很有道理的:犹太人一旦被送进集中营,就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按其身体状况,把能干活的人挑选出来去服苦役,把体弱者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杀害。并有专门的医生做活体医学实验,随意从活人体内取出一些器官,以观察和记录病体的反应,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而且,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也是建立在消灭劣等种族以保证优等民族的纯洁性的优生学医学假设之上的。从福柯的权力观来看,纳粹反犹太大屠杀是国家机器对一个种族生存权极度操控的具体表现。

二战结束后,以文学的方式再现大屠杀的历史及其后遗症成了美国犹太小说的重要主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要的犹太小说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和艾萨克·巴·辛格(I. B. Singer, 1902—1991)等,都从正面或侧面、或繁或简地描写了大屠杀及其幸存者的情况。把这些小说集中在一起,则呈现出一幅犹太大屠杀历史的全景图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叙事模式。它们再现了犹太人从最初受限制、遭隔离,到被运往集中营,到进毒气室、被毁尸灭迹的全过程;也表现了幸存者如何抵抗、躲藏,受到谁的帮助逃脱纳粹的魔掌,怎么辗转转到美国定居,他们及其后代如何受大屠杀后遗症的折磨,等等。

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的发展历史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期间没有多少反映大屠杀的小说,对大屠杀的描写也不怎么直接。作家们似乎在沉默中探索表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灾难的合适方式。但索尔·贝娄的《受害者》(*The Victim*, 1947)中用了大量的象征意象(如欧洲犹太人都必须佩带的黄

色六角星徽章标志、拥挤的火车、反犹分子阿尔比的言论等)来体现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可以算是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的先锋之作。第二阶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幸存者回忆录和访谈录的出现,美国文坛涌现出了大批直接描写大屠杀的历史小说,形成了大屠杀小说的创作高潮。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时候出现了有关幸存者后代的作品。归纳起来,美国犹太小说再现大屠杀历史的方法有下列六种。

一、对犹太大屠杀及其后遗症的直接描写

这类小说最多。最直接、最全面描写大屠杀整个过程的美国小说要算杰拉德·格林(Gerald Green, 1922—)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 1978),因为它交叉运用幸存者“鲁迪·魏斯的自述”和纳粹党卫军少校“埃里克·道夫的日记”,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给读者提供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从各自的视角展现的历史,既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实录,又有战后对情况的证实。正如作者在“前言”里所说,这部回忆录要以一斑窥全豹的方式,围绕受害者一家和加害者一家各自的经历,反映大屠杀时期的整段历史。读者从中可以了解犹太人是如何受限制、被欺骗、被没收财产,家庭成员如何先后分别被送往集中营、被利用(如鲁迪的父亲被派去修路,哥哥画画);也可以看到觉醒后的犹太人是如何互相帮助(父亲以医生的身份从开往集中营的死亡列车上救下了不少犹太人),如何悄悄地进行反抗(哥哥用画笔真实记录了集中营的纳粹暴行并因此而遭到毒打,手指全部被打断也没有透露藏画的地点;弟弟离家逃亡、参加游击队袭击纳粹分子;叔叔则参加地下组织,想办法弄到枪支在隔离区进行抵抗,最后因寡不敌众而英勇就义)。“埃里克·道夫的日记”则记录了纳粹分子如何进行欺骗宣传,不留文字记录,不用“屠杀”等字样,而用“迁居”、“最后解决”等词,并把进毒气室说成“洗淋浴”,以此掩盖其真实目的,并设立模范集中营,以应付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组织犹太画

家作画,美化集中营的生活,欺骗世人,事情败露后,又销毁罪证的事实。总之,这部小说真实、全面地描写了大屠杀从开始到结束的历史。

艾萨克·巴·辛格在《情敌:一个爱情故事》(*Enemies: A Love Story*, 1972)中描写了大屠杀的后遗症之一——对婚姻的破坏。犹太主人公赫尔曼二战期间在波兰人家的干草棚里躲藏了三年,幸存下来。后来有人证实,他的犹太妻子塔玛拉和一对儿女都死在集中营中。他就和曾冒险帮助他躲藏的波兰农村姑娘雅德维伽结了婚,来到了美国,并有了一个犹太情妇玛莎。没想到,妻子塔玛拉并没有死,而是几经周折来到纽约找到了赫尔曼。这样,他就有了两个妻子和一个情人。这三个女人就成了小说题目中的“情敌”。赫尔曼本来就经常梦见纳粹分子来到纽约捉他,因而神经非常紧张,现在又要在三个地方周旋于这三个女人之间,难做取舍,结果弄得精疲力竭。在情妇自杀后,赫尔曼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最后只好自我逃避,远离两个妻子。

辛格通过赫尔曼的经历,表现了侥幸躲过大屠杀而不知家人下落的犹太丈夫或妻子所面临的痛苦选择,他们困扰于要不要再婚以及和别人结婚后,万一以前的配偶找回来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中。小说中,赫尔曼受负罪感(幸存者对被杀者的负罪感、再婚的他面对第一个妻子时的负罪感、他和第一个妻子交往时对现任妻子的负罪感,等等)的折磨,生不如死。与此相反,劫后余生的塔玛拉发现丈夫赫尔曼又结了婚后,本可以根据亲戚的建议先和赫尔曼离婚,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但她没有这样做。集中营的遭遇让她学会了宽恕和容忍,她没有怪罪赫尔曼的再婚,而是在他消失之后,主动照料他的即将生孩子的现任妻子。在小说结尾的情节中,犹太幸存者塔玛拉无私帮助没受过多少教育、在纽约大都市里担惊受怕的波兰农妇雅德维伽。读者阅至此处,都不禁会思索:这是对波兰人当初帮助犹太人的回报,还是经过了集中营的磨炼之后,塔玛拉具有一种救助弱者的本能?两个“情敌”真的能同甘苦、共患难吗?中国学者对这部小

说的评论大都集中于谴责赫尔曼的见异思迁,而没有提及大屠杀的后遗症对他的折磨。而这里我们可以换一角度进行分析,赫尔曼躲过了大屠杀,得知妻子儿女都死了以后,万念俱灰,唯独对喜欢他并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躲藏的波兰农村姑娘雅德维伽心存感激,这样才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加上雅德维伽没有多少文化,连英语都不太会讲,在纽约不敢出门找工作,整天关在家里,处处依赖丈夫。赫尔曼于是对她慢慢厌倦,而后通过寻找情妇来排遣大屠杀带来的痛苦。整部小说的焦点还是大屠杀的后遗症。

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 1928—)的《披肩》(*The Shawl*, 1989)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犹太大屠杀作品,由一个真实再现集中营历史的短篇小说《披肩》(“*The Shawl*”, 1980)和一个虚构的中篇小说《罗莎》(“*Rosa*”, 1983)构成。二者虚实并置,历史的过程与对历史的认识互相阐明,合并成一个典型的新历史主义文本。《披肩》通过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真实经历和感受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外在的死亡营;《罗莎》则在揭示幸存者个人内心的痛苦,特别是惨痛的记忆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个内在的死亡营。后者的主人公罗莎30年来一直摆脱不了历史的阴影,其言谈举止有些疯疯癫癫。她的大屠杀后遗症表现在行为古怪(亲手砸碎了自己的旧货店)和态度傲慢(出身高贵的她现在沦落为靠别人接济为生,但她仍然看不起地位比自己低的犹太人)以及心胸狭窄(依靠侄女的经济资助,却老是和她斤斤计较,说她的坏话)中。她讲述的历史往往和短篇小说《披肩》中所说的不一致。这就提出了大屠杀小说文本中的历史模糊性或复数性问题。面对同一事件或人物出现了不同的叙述版本,比如,在短篇小说《披肩》中,作者不动声色地直接记录了犹太小女孩玛格达被纳粹士兵扔到集中营的电网上杀死的惨状,以及母亲眼睁睁看着幼女被杀而无力施救的事实。这一情节取自历史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简短描述,有历史根据。而在《罗莎》中,母亲罗莎却说玛格达还活着,而且还当上了医生和教授。而女儿的职业究竟是拥有“两间诊所的”医生(Ozick 35),还是“希腊哲学教授”(Ozick 39),小说没有

明确说明。读者只能把这种文本的模糊性归因于罗莎因大屠杀后遗症所产生的疯癫。另外,在《披肩》中,斯太拉说玛格达是罗莎被纳粹士兵强暴后所生,因而她有蓝眼睛和黄头发。(Ozick 4)而在《罗莎》中,罗莎却在信中告诉玛格达:“你父亲是我的母亲最好的朋友的儿子。她是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嫁给了一个非犹太人”(Ozick 43)。她还要玛格达别相信斯太拉的谎言,说斯太拉是出于对玛格达的妒忌才那么说的。究竟是斯太拉在撒谎,还是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的罗莎在编故事,读者也只能猜测。不过,文本的不确定性正反映了大屠杀在人物身上留下的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小说的形式与主题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其实,罗莎的故事主要不是说给读者听的,因为她知道我们没有集中营的经历,不可能完全理解她作为幸存者的感受。所以,她的故事只是说给玛格达听的,她需要向女儿解释自己的行为,(Budick 224)正如她砸烂自己的旧货店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顾客能理解这些旧东西所代表的历史和过去——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一样。

二、厚描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

几乎每一个集中营幸存者都会做恐怖的噩梦,所以小说家把梦幻变成了一种叙述方式。美国犹太小说中对这些梦再现得最集中、刻画得最逼真的可能是爱德华·刘易斯·沃兰特(Edward Lewis Wallant, 1926—1962)的《当铺老板》(*The Pawnbroker*, 1961)。这些梦的自然主义文本表现形式很特别:全用斜体字穿插在正文中间,两种字体代表过去和现在两种时间进程,显示出过去的恐怖经历会时不时地来干扰主人公索尔现在的活动。把前六个噩梦串起来一起读,读者也会有有一种到地狱走了一圈的恐怖感。比如,第一个梦的画面聚焦于遭遣犹太人前往集中营的牲口车(cattle car)——车厢内拥挤到任何人都动弹不得的程度。索尔的儿子被挤在大人的腿部,一直往地板上的粪便中滑下去,向父亲求救。但是,索尔站着动弹不

得,连弯腰拉儿子一把都不可能,最后听到儿子倒下,呕吐不止,闷死了。儿子的无助、父亲的无能为力以及母亲对父亲没有救儿子的责备,这些情景都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另一个梦讲述纳粹士兵对企图逃跑的犹太人的严酷惩罚:先放几条大狗去撕咬,把血淋淋的逃犯逼向铁丝网,等他爬上铁丝网后,通电将其电死。站在一旁观看的同伴们闻到他被电击烧焦的气味,都忍不住要呕吐。这样的梦的反复出现,表明索尔无法摆脱惨痛记忆的折磨,永远生活在集中营阴影中的心理状态。

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 1928—)的回忆录《夜》(*Night*, 1958)从一个15岁男孩的视角,描述了集中营被解放前夕所发生的情况。回忆录题目中的“夜”指的是主人公埃利扎全家被送进集中营的第一夜,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和妹妹的一夜,是他第一次看到纳粹士兵把一卡车儿童倒进熊熊燃烧的火坑的一夜,也是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开始集中营炼狱生活的第一夜。这个文本展示了其他大屠杀小说里很少提及的一些重要细节,比如“大挑”的情节——纳粹医生每周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进行体能测试和检查,把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规定距离的体弱者挑选出来,送进毒气室处死。这使得犹太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只好拼命干活,并设法多弄点吃的,保持身体强壮。埃利扎的父亲最后就是因为生病不能干活被处死了。另外一个细节是苏联红军的大炮快打到集中营时,集中营不断撤退的情景。犹太人在大雪天被装进敞篷牲口车,运往另外的集中营。一路上不断有人冻死,每到一站,都要从火车上扔下许多尸体。埃利扎所在的车厢在起点站装有100人,到终点站时,只有12人走下火车,其他人都会被冻死、饿死了。十几岁的主人公经受了这么多艰难的考验,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但他的家人全死了。作者“维赛尔出版过80多本著作,《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维赛尔的贡献不只体现为文学创作的成就,更体现在为受难幸存者站出来,向世界‘作见证’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行动上。维赛尔的名字因此与‘幸存者’和‘见证者’连在了一起”(徐贲 211—212)。如果说《安妮

日记》从一个十几岁女孩的视角着重再现犹太人在被送进集中营以前躲藏时担惊受怕的心理状态,《夜》则从一个十几岁男孩的视角描述了犹太人在集中营所受到的非人的身体折磨。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大屠杀对犹太儿童在心理和身体上的摧残。

三、表彰帮助犹太人逃亡的机构和个人

幸存者得以逃脱纳粹的魔掌,大都有好心人相助,正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所示。索尔·贝娄的中篇小说《比拉罗萨内线》(*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1989)的题目就是一个地下营救站的名称,指明了小说会描写这个帮助犹太人逃亡的地下通道的活动情况。“比拉罗萨”(Bellarosa)是美国著名的犹太歌曲作家和百老汇夜总会老板比里·罗思(Billy Rose, 1899—1966)名字的谐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资建立了这个地下营救站,帮助许多犹太难民逃脱纳粹的追捕。小说的男主人公方斯坦恩就是被这个地下组织救助后转移到美国的犹太难民。

贝娄的小说通过方斯坦恩的回忆,描述并赞颂了地下营救站对意大利罗马犹太难民的帮助。方斯坦恩讲道:“我当时一个人在牢房里……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隔着铁栅栏和我说话。……他说:‘比里·罗思’。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一个词还是两个?是指男的还是女的?这个意大利人的口信是:‘明晚这个时候,你的牢门会被打开。你出去,在走廊里一直向左转弯。没有人会阻拦你。有个人会在小汽车里等你,他会把你送到火车站。”(Bellow 10)第二天晚饭后,看守果然没有锁方斯坦恩的牢门。方斯坦恩发现走廊里没人,就出来打开了所有的门,上楼,下楼,来到了街上。果然有一辆车在那里等着,司机把他送到火车站,并给了他新的证件。并说,不会有人来抓他了,因为他的档案已被偷出了警察局。方斯坦恩来到指定的旅馆,有人和他接头,让他坐轮船去里斯本。他就这样逃出了纳粹

的魔掌,从犹太民族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中幸存下来。小说一再强调说,比里·罗思是方斯坦恩的救命恩人,没有他,方斯坦恩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包括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当然,小说也描写了幸存者本人的生存技巧,比如,方斯坦恩学语言非常快,可以说好几种外语,这使他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辛西娅·欧芝克的长篇小说《吃人的银河系》(*The Cannibal Galaxy*, 1983)中的小学校长约瑟夫回忆了自己十几岁时躲藏在巴黎的一个女修道院的地下储藏室里、受到四个修女帮助的情况。她们每天给他送吃的,并把他的便桶拿出去倒掉。后来还给他送来了一个牧师死后留下的几箱藏书和一个收音机,这些书不仅让他打发时光,在不见天日的环境中保持头脑清醒,还深深地迷住了他,为他日后的世俗和犹太双重教育并重的理念埋下了种子。当一个小女孩来到储藏室发现他后,这四个修女马上给他乔装打扮,用汽车把他送到了郊外。他藏在一个农民的干草棚里,后来又被锁在农具间里,在寒冷的夜晚,他曾爬进牛棚,靠在母牛身上取暖,才得以活下来,躲过大屠杀,战后来到了美国教书。几十年后,约瑟夫回法国探望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三个姐姐(其他家人都死了)时,还特意去那个女修道院感恩,但没有见到那几个好心的修女。

四、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记录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的很多小说都提到了大屠杀,但重点不在描写大屠杀本身,而在于分析人们对大屠杀的反应。他对大屠杀最深刻的反思体现在《夏洛克行动》(*Operation Shylock*, 1993)这部小说中。作品再现了1988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对约翰·德米加尼朱克于1942—1943年在纳粹集中营犯下的“反人类罪”案件的审判。这个人被称为“恐怖的伊万”,因为他看管毒气室时特别残忍,常常用铁管毒打那些赤身裸体、等着进毒气室的犹太人,有时还用刺刀捅他们,以获取变态的享乐。死在他手中的犹太人

不计其数。对他的审判持续了一年多,作者着重描写了一次法庭审判的过程,包括证人的证词、律师和法官的观点、有关新闻报道,以及人们对审判的反应等。这部小说其实也是在为纳粹的残暴作证。

这本小说区别于其他大屠杀文本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了纳粹的残暴,还从犹太人自己的视角反省这一灾难何以发生。小说中的一个犹太作家说:“人们至今都普遍认为:犹太人机敏,圆滑,世故,大脑里装着全世界的智慧。但是,要欺骗犹太人不是简单得很吗?用最简单、几乎是孩子气的把戏,就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凭虚幻的希望就能让他们饿几个月,最后用火车把他们送上不归路”(Roth 85)。纳粹分子正是利用了犹太人的某些弱点,才得以实施大屠杀。这种写法符合罗斯的一贯风格: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他们更完美的角度出发,揭露犹太人内部的问题,比如他们太相信敌人,反抗的力度不够等。

五、表现幸存者后代的愤怒和救赎

有关幸存者后代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它们的重点不在大屠杀本身,而在于表现幸存者的后代们在幸存者的家庭氛围中的成长经历和感受,其中,年轻犹太作家塞恩·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 1960—)的《被动吸烟》(*Second Hand Smoke*, 1999)最有代表性。

《被动吸烟》揭示了大屠杀对幸存者后代心理上严重的间接创伤,这正是小说题目的含意。作者在“序言”里指明了小说的主题:大屠杀塑造了幸存者后代的生活,创伤永远不能治愈。大屠杀后遗症变成了一种痛苦的遗产,下一代不管喜不喜欢,都得接受。可能是受母亲的影响,主人公邓肯的一生的工作都与大屠杀有关:他先在政府部门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因为用不正当的方式取证被停职,后来在大学里开设大屠杀课程。他一生经历的转折点去母亲的出生地华沙寻访未曾谋面的哥哥,并参观集中营旧址。而在这之前,他一直以

为自己是妈妈米拉的独生子,但妈妈临终前却托人告诉他:他有一个哥哥叫艾萨克,在华沙。米拉战后从波兰逃出来时,没能把六个月大的儿子带出来,却在他细小的手臂上烙下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号码,算是留给永远不可能再见面的儿子的遗产,也给幼小的儿子永远打上了大屠杀的印记。米拉逃到德国后才遇到了邓肯的爸爸,两人结了婚。米拉死后,40岁的邓肯到波兰去寻找哥哥,希望后者能告诉他母亲在波兰的情况,却发现艾萨克对母亲的事一无所知,但她从身材长相和性格各方面都酷似米拉,而且母子两人的左手臂上都烙着同一个号码。邓肯觉得,艾萨克身上处处有母亲的影子。兄弟二人代表了对大屠杀遗产的两种态度。邓肯代表的是愤怒的大屠杀幸存者后代,见到德国人和德国产品就生气,而艾萨克则代表着对大屠杀遗产的理性救赎态度——他一辈子生活在波兰,处处可见大屠杀留下的见证,却能心平气和,默默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教授瑜伽、看护犹太墓地等等。邓肯从艾萨克的瑜伽课上学会了如何吸气,如何控制自己心中的怒火,如何从创伤中走出来,更平静地笑对人生。

作者在讲述各个人物的故事的同时,还对大屠杀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发表了评论。比如,在描写邓肯因为是幸存者后代和纳粹战犯的追捕者与审判者而受到各家电视台的邀请去做节目的情况时,小说评论道:美国人对大屠杀的兴趣有增无减,各大媒体争相“在大屠杀的王国里挖掘出独特的一角,”“部分是因为它是大灾难,部分是出于好奇”(Rosenbaum 114)。有关大屠杀的访谈节目成了电视台提高收视率的高招。

六、对大屠杀经典文本的后现代改写与重构

罗斯在分析人们对大屠杀的反应时还探讨读者对大屠杀经典文本的解读方式。他在《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1979)中就对《安妮日记》(*Het Achterhuis*, 1947)这个现代犹太经典文本进行了后现

代的解读。他想象安妮获救以后化名艾米来到了美国,成了一名著名犹太作家的学生和情人,当了一个破坏老师家庭的可耻的第三者。罗斯把世人同情的犹太受难者的正面形象改写成了一个反面角色,把一个圣徒变成了一个不顾亲情、唯利是图的凡夫俗子。我们看到,作品中的安妮虽然已从《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得知父亲奥托·弗兰克健在,并看到了他的照片,但为了不让世人知道自己还活着,以维持安妮的犹太殉难者形象和《安妮日记》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她决定不同60岁的老父亲联系,不让他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女儿活在世上。如此对待受过集中营折磨的父亲,显得忘恩负义,完全不是一个好女儿。

罗斯在《鬼作家》中借对已成为犹太传统经典文本的《安妮日记》的非神圣化、颠覆性的大胆改写,把正面的历史人物形象反面化,标明了自己与马拉默德等从正面刻画犹太人的苦难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区别,为自己所选择的剖析犹太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反传统的后现代小说创作道路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小说中,犹太作家朱克曼想同安妮结婚,主要是为了借助这个犹太圣女的崇高地位提升自己,让父亲等人不再把他看成专门在创作中揭露家丑的犹太叛徒。反过来说,朱克曼又通过把神圣的安妮转变成不念父女之情的凡夫俗子,拉近了她和自己的距离,并准备在得不到父亲对自己的写作题材的理解和谅解时,学习作家安妮的榜样,为艺术而牺牲亲情。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改写,主人公朱克曼既可以利用安妮过去的崇高地位来缓和自己同父亲的矛盾,又可以利用她现在的反叛父辈的行为,来为自己解决创作困境服务”(刘文松 60)。小说中的这种后现代戏拟,目的在于把庄重的变成滑稽的,以达到为小说人物和主题服务的目的。

罗斯通过对《安妮日记》的戏仿式续写,传递出美国文学界对待大屠杀的另一种态度:不能把与大屠杀有关的东西都当作偶像来崇拜,以达到某种学术、经济、宗教或者政治目的。而应该允许人们对这一历史灾难做出不同的解读。仅仅哀悼犹太人的不幸、咒骂纳粹

的残暴是不够的。世人应从正反两方面反思历史,汲取教训,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发生,特别是警惕新纳粹主义的抬头。

有趣的是,1914年出生在中国天津的美国作家约翰·赫赛(John Hersey, 1914—1993)的《隔离墙》(*The Wall*, 1950)揭示了这部小说重构犹太大屠杀历史的写作过程。小说描述如下:1939年直至1943年间波兰华沙犹太人被迁入隔离区后,重新组成社区,后受纳粹分子的欺骗宣传,被迁出去“重新安置”,结果发现他们是被送往50英里以外的死亡营。一些勇敢的犹太人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终因武器落后而失败。在整个过程中,一个学者以采访的方式,用日记记录下了主要的事件和特殊的经历,累积的档案资料达到400多万字。他明知犹太人的抵抗维持不了多久,不会有多少幸存者,自己也难以活命,为了保存书稿,将其用布一层一层仔细包好埋入地下。并留下详细说明寄给隔离区外面的犹太人,好让人以后找到书稿。小说家以编辑的身份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将其压缩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挑选出几个家庭的经历作为主线,围绕40多个人物讲述故事,形成了这部小说。小说家写的“编者按”详细记述了这些原始档案资料被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经过,以及其被保存、整理和翻译的过程。所以,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但详细记录了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前的抵抗经历,而且写明了他们如何保存这珍贵的历史文献。

把上述几类小说放在一起阅读,我们发现大多数美国犹太作家都对大屠杀历史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美国犹太小说对大屠杀的整个历史过程都进行了很好的回顾和再现:突出了犹太人从最初受限制、遭隔离,到被运往集中营,到进毒气室、被毁尸灭迹的全过程;也表现了幸存者如何抵抗、躲藏,受到谁的帮助逃脱纳粹的魔掌,怎么辗转回到美国定居,他们及其后代如何受大屠杀后遗症的折磨,等等。罗斯等小说家还提供了对大屠杀经典文本的改写和重构方法。由这些小说所建构出的大屠杀全景图对中国读者全面认识大屠杀的历史过程和美国人的后大屠杀意识很有裨益。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Bellow, Saul.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 Budick, Emily Miller. "The Holocaust in the Jewish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Eds. Michael P. Kramer and Hana Wirth-Nes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 Ozick, Cynthia. *The Shaw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 Rosenbaum, Thane. *Second Hand Smoke*.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 Roth, Philip. *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London: Vintage Books, 1993.
- 福柯：“性的教官萨德”，《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 刘文松：“《鬼作家》对《安妮日记》的后现代改写与困惑”，《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56—60页。
-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